

文学写作与诗性空间
——邢海珍诗学论集

邢海珍◇著

文学写作与诗性空间
——邢海珍诗学论集

邢海珍◇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写作与诗性空间：邢海珍诗学论集 / 邢海珍著.
--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12
ISBN 978 - 7 - 81129 - 534 - 4

I. ①文… II. ①邢… III. ①新诗 - 诗歌创作 - 中国
- 文集 IV. ①I 207.2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7655 号

文学写作与诗性空间——邢海珍诗学论集

WENXUE XIEZUO YU SHIXING KONGJIAN——XING HAI ZHEN SHIXUE LUNJI

邢海珍 著

责任编辑 安宏涛 罗 艺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304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534 - 4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灵魂主峰的诗性布展

——邢海珍论

林超然

到底诗歌是邢海珍的一部分，抑或邢海珍是诗歌的一部分？

不知为什么，一想到他同诗歌彼此辉映的特殊关系时，我总会记起清代袁枚的《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种从苦涩中奋力举起清芬的一幕是我的臆断，实际上与邢海珍毫不相干，他的辞书里压根儿没有“寂寞”二字。这不单因为他显然是诗坛上的一株夺目牡丹，还因为他无边无际、从未间断的快乐缔造行动——遍及诗歌内外，并且由“独乐”引领“众乐”。他有一本诗集名曰《远距离微笑》，时间之遥、空间之远、语境之偏，都构不成任何阻隔，他始终在向世界会心地微笑，而微笑恰是最安静、最深刻、最彻底的胜利。

邢海珍用一部饱满的《文学写作与诗性空间》坚定地证明：文学写作是重返心灵的特别路径，是端详时代的珍贵形式，是直面人间的可敬记忆，是响应生活的积极姿态，是理论研究的前置景观。此书从诗性的角度阐发了文学写作的话语形态、艺术表现、文体特征等诸方面的规律性问题，对文学写作与相关阅读具有强劲的带领意义。作者兼具诗者、论者、师者三栖身份，借重一种新异的感悟、深邃的体验与个性理解，把诗歌高置为人间美学的终极寻找与最后皈依。

应该有一个什么部门专为邢海珍颁发一种“诗歌特殊贡献奖”的，因为他同时是写诗、论诗、教诗三个向度的卓越代表。如今中国新诗史已被物化时代冲撞得七零八落，从学习、创作到研读，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富于生命感的链条，而且这种诗歌生态还在恶化。中小学的教科书上几乎不能给我们提供多少有效的新诗经验，孩子们的诗歌润泽只能来自别处——课外书籍、网络，还有道听途说；不少诗人

早把“有益无害”信条抛之脑后,放任自己的文字在下一代那里成为一种凶恶的语言暴力;当下多数诗歌执论者,都是“考来的”评论家,考成博士、专家,又碰巧他们选定的讨论对象是诗歌,对诗歌所知甚少却毫不妨碍他们永远振振有词;大学里诗歌写作的讲授者,多是教授而不是诗人,那些吓人的理论在课堂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动真格时却百无一用寸步难行。而邢海珍的写诗、论诗、教诗却互为表里不可拆分,融会贯通浑整一体,他的作品、他的论证、他的讲义都是环绕诗歌的一种纯粹。

一、写诗:一骑绝尘

邢海珍曾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诗刊》《星星》《青年文学》等处发表诗歌作品 1500 余首,常有作品被译介到海外。《忙于招生忙于考试的中国》《历史深处的河流——关于国歌的意象》《涂在一个黑夜的血色——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祭》《卢沟桥茶色写意》《想起鲁迅先生》等长诗都是诗界的美谈;大量的、以古代作家作品为素材的诗作,可以看成是他对古典艺术的现代阐释,组诗《诗经深处的春天》(7首)、《在唐诗的大境中叙事》(18首)、《宋词人物志》(7首)等都是独步诗坛的壮举。邢海珍的诗歌往往让人想到宁静、开阔和悠远,作品中的火气难得一见,但这并不影响他的褒贬表达。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童年,当邢海珍把眼光投向它时神情立时凝重异常,诗人陷入深深的感动难以自拔。“诗经的叶子/有一滴神性的露水闪动。”(《静女》)这是以真诚的生命靠近诗歌的性灵震颤,流溢着一种难以诉诸语言的敬意。我们很容易悟到诗人对远古往事的关切和追怀,诗人的儒雅风度、诗中弥漫的文化精神和人格力量以及诗中隐隐现现的思辨之光,使人备感亲切并为之折服。“今日的纸上仍是蒹葭苍苍/不绝如缕的情怀/典雅而真切/透过这些植物的缝隙/谁在寻找呢/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在诗人恬淡、纯净、透明的情绪里,知性和深情跃出文字,清清爽爽地走到化日下,人们的心事不约而同地随着这些诗句一道沉浮。读他的《诗经》组诗,人们的心上满是伫立春天时的感奋。“你眉目传递着春天的消息/许多柔嫩的青草/在遥远的阳光下私语。”(《静女》)“读诗/我们沉思良久/向着寻常的汉字/找回一些春天的玄妙。”(《君子》)“园有桃/我们结队来到树下/大地的回声在天涯之外/抬起头来太阳高出树顶/顺手翻开诗卷/园有桃/含满眼春光。”(《园有桃》)在一种人类情感和艺术使命的感召下,诗人沿着《诗经》的形式进入《诗经》的内容,他的超拔之处在于从普通人都有的生活体验中发现不平常的审美意义,诗中的“春天”有着脉络迹象和层次属性。第一重是自然的春天,它存在于我们的意念之中,也存在于我们的意念之外;第二重是人的春天,文人们总会虔诚地把自己的人生旅途切割成与大自然相类的时段,并陪伴草木的荣枯而

微笑或流泪；第三重是文化的春天，既然春天是一种美妙和文化的表征，那么文化千秋不败的精魂就是我们精神意义上的春天。邢海珍也走在历代文人走过的一条旧路上：身陷现实生活的困境；谋求自尊、自重的终极实现；试图通过拓展精神空间，来求得心灵的自适和自我人格的雕镂。“《诗经》组诗”中这三重深含理趣的春天，足以使他处于自我亢奋和自我沉迷状态，他终于有了自己的满足。

意蕴雅致，章句平实，高贵的诗人气质和深层民族文化心理的有机结合，是邢海珍诗歌独具的艺术特征和美学风格。这首《白居易看乡亲割麦》就是明证：“一夜南风/白居易的麦子全在诗中黄了/中唐大地一时镰声四起/一刀一刀地/全是五言的节奏/诗人在五月写下丰硕的诗篇/那些割麦的乡亲/在一首著名的诗中汗流浹背//一个又一个世纪/在书页中翻过去/割麦早成永久的往事/善良的诗歌一路走来/像仙风袅袅/到这片朴素的麦田里/看人间农事//那位捡麦穗的贫妇/从容走进不朽的唐诗/一弯腰 便拾起现实主义的文字/装进忧郁的筐中/是白居易把这来自民间的营养/送给失血的历史吃了一口//三百石禄米/让诗人在心中愧怍了千年/一种灵魂的检讨/在中唐割麦的镰声中/让诗的良知格外沉重。”这是两位诗人隔着时空的一次交流，邢海珍以白居易那首《观刈麦》作为精神底色，有关原诗的内容诸如五言体式、写作背景，白居易的亲民救世思想，还有中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当然也包括对唐诗的价值判断，都浓缩其中，这是诗歌作品也是文化评论，是虔心继承更是发扬光大，充满了现代人的深沉颖悟。

尽可能地占有和尽可能地摒弃，是诗歌对于一个诗人“全知全能”的最大考验。在这种考验中，诗人会使出自己浑身的解数来施展和表白。因着古今文化的冲击与碰撞，因着诗人的易感神经，邢海珍情不自禁地走出了内向与羞赧，开始对这文化现象进行自己的认知。作为一个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人格与社会、肉体与精神、世俗与信念、城市喧嚣与书斋岑寂交叉地带的诗人，他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冷静。诗人重返传统又不困于传统，这种打破、重建的气魄确是不同凡响，诗人在洞察时代幽微的同时，又对远古的诗意情有独钟，这是诗人对一种古老文明的深切的崇敬和深沉的牵挂。

邢海珍对于当下生活，也会用一种传统的诗意进行淘洗。“在远离山林的地方/我找到了自己/雄风和毛色荡然无存/危崖在年龄的水中/早就夷为平地//许多伤痛/本是与生俱来的/咬紧牙关/擦开心灵上空的云/向暗夜一寸一寸地找回道路/我似乎没有家乡/我只把孤独的名字/深埋在最后的本质里//仰望天籟中荒凉的曙色/箭矢正从低矮的史实中穿过/那是多少个生日的笑容/森林在远方/苦难的泥沙堆积骨骼的高度/我在属相的背后/冷峻地站着//虎/这兽中之王/在一种动人的生肖里/衔起我许多平淡岁月/朝着意志和力量的前方奔去。”（《属虎》）邢海珍乐于确信自己与属相有一种奇妙的对应，诗中有诗人面对虎的诸多感慨，有对自己

生命历程的回顾,有对纯洁朴素事物的追思,有对光阴逝去的感伤。虎和光阴比照都有一种流逝的属性,作品突出了生命力和虎的血肉联系,好在人生虽是一个很疲惫的过程,但到底充满韧性,充满想象,充满回味。

无疑,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国古文化始终是中国文人灵魂的憩园,现代社会近乎绷紧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人们势必寻到一种方式排遣自己,然而这样的回避终究是暂时性的,毕竟人们还要不可避免地吐纳现实的空气,还要老实地正视自己的责任,“隔着一大叠厚厚的史书/我看见你/静女/在没有污染的水边洗脸/在百花盛开的草地上歌唱”(《静女》)。现代经济面临的自是崭新的纪元与曙光,商品化的步伐已把乡间田畔的小农经济还给历史,但是我们分明感到,现代文明也带来了不可小觑的多种垃圾。诗人的使命感使邢海珍对生存环境倾注了太多的关切,一种潜在的危机离我们只一步之遥。这几行诗躲在组诗的角落,似乎是诗人不经意的一笔,却足以使人触目惊心。这实在是诗人暗隐的、对个体责任意识 and 人类前途的深深忧患。所有的文化偶像最终都会走出我们的视线化为尘土。我们再也抓不住历史的裙带了,我们得学会自己走路。作为文人诗歌、知识分子诗歌,邢海珍的作品少有大起大落的波澜,少有涂着各式血泪的沉痛,而更多的是阅尽人生种种之后的原谅。在心灵颠仆的时代,他的诗歌显然会成为一种可贵的安慰。

二、论诗:静水深流

邢海珍是蜚声海内的诗歌理论家,先后出版过《诗在灵魂高处》《诗意的美质追寻》《生命在风雪中——梁南论》《中国新诗三剑客》《诗的朝圣之路·李松涛论》《文学传统批评》等批评专著,曾发表诗歌理论文章 150 余篇。《文学写作与诗性空间》一书则大致浓缩了邢海珍这些年来学术努力的三个基本向度:基础理论,诗艺探究,诗人评介。

从某种角度说,在基础理论上着墨较多的人都是敢于犯险的。“理性”“情感”“想象”等在文学理论中都是特别夹缠的范畴,很容易让持论者左冲右突而终陷其中——最好不碰,而邢海珍却以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扎实的沉思成果一一廓清。在邢海珍看来,“理性”而非“理论”,它以一种寄托的方式内蕴于艺术的情境之中。文学中必要的“议论”并非不可,只是有些文体尚须适度。“理性”在文学的表达中,应不失一种“趣味”的状态,仅有情境不可,而要显现足够的艺术灵性,追求韵致,追求感染的力量。文学的主题不是一种明晰的思想,而是一种模糊甚至是一种迷茫的形态,所以主题并不完全都是“思想”,有时比思想粗糙,有时比思想更微妙。邢海珍让“理性”从高位上下来,写作者和阅读者都可以松一口气了。

这些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可能并不光鲜亮丽,但是常常是更为重要的,也更能见

一个学者的使命意识。为避免更多的人在常识的门槛前滑倒,就要有人站出来做平凡却也同样崇高的引导工作,此时邢海珍总会有超乎常人的“耐烦”。比如他在诠释于各种表达里进进出出的“诗意”时说:“一是广普的称谓,即人在生活中所能体验到的一切美感形态,当然也包括人类的艺术活动,凡能引发人对美的事物的感受,均可称为‘诗意’。二是文学艺术的称谓,即指文学艺术作品中由创造主体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法创作而成的情境和氛围,并在受众的心中产生一定的感染效应,这种艺术的美感形态也可称为‘诗意’。三是诗歌文体中的具体称谓,即指诗歌的意境,诗歌是通过‘境’来表‘意’,诗意也就是诗的美感。还可进一步拓展,诗是抒情的文体,诗意即是诗人情感表达的基本形态。”他视诗意为文学的本质因素,并把它划分为三种范型:实物呈现型、事态因果型和象喻指涉型。他认为任何诗歌以外的艺术都暗含着诗,它们之中的诗意都是一种“诗”的转移,是艺术家诗的素养、诗的情怀的转化趋势:“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诗意本身就是不能缺少的文化元素,它以美感、意趣、情调、氛围成为独特的文化内涵,使人的心灵空间更为深远和谐。文学诗意在整体诗意中居于重要的位置,全面深入地体现了自身的文化功能和价值,具有明确的质的规定性。”

端详新诗歌时,邢海珍的神情格外凝重:“新诗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事件,它像一抹鲜亮的霞光染红天际,提醒人们去注意这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早晨。”他觉得关于新诗的“血统”问题最主要还是语言传统的问题,既然汉语的语言体系尚在,它只能是中国传统,新诗源自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诗歌,旧诗的“血”流进了新诗的体内,新诗与旧诗在“诗”的本质上是是一致的。外来文化主要是激活了新诗的某些情性,它一旦进入汉语系统,便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诗的文体中化入了“中国”的体制,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至于“白话”的提法不过是新诗初创之时的权宜之计,因为当时是为了让新诗与旧诗有一种明显的文体区别,让新诗站稳脚跟。而时至今日,新诗与旧诗再没有必要那么水火不相容,完全可以把各自死死关紧的大门打开一些。至此,经由邢海珍入情入理的诠释,“中外之争”“文白之辩”都似可以暂时各安其位了。

新诗是心灵的事业,是人类精神空间中不可或缺的景致,不能因为暂时的势头如何就对诗作出优秀与否的判断,至少写作新诗的人们要有一种自信。中国新诗的未来不可能在热烈的掌声中引人注目,不会大富大贵;它只会平静中求发展,也不会大起大落。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中国新诗必然发生许多变化,比如说“边缘化”“世俗化”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诗歌的一些品性,这是文学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必然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个人化写作始,尤其21世纪以降,凭着现代传媒的特殊便捷,新诗写作进入了全面自由的状态。当然,即使出现了“大众狂欢”的景象,也不是诗的真正普及,与诗有关但不真正等于诗,大众

对于诗歌的艺术参与促进新诗发展的力量也极为有限。诗歌文体的自娱性,是中国新诗走向“写作时代”的内在因素,应当引起诗人们的重视。邢海珍说,从“自娱”到“他娱”,从“写作时代”到“阅读时代”才是中国新诗的真正出路。

邢海珍认定“诗与人的生命同在”,诗歌精神是人类永远不能丢失的希望之火,无论任何时代,诗都将找到自己的形式而成为抵达生命高度的天梯。“可以说‘心灵’这个词的组合是别有深意的,如果说‘心’是器官,那么‘灵’则是‘心’之上的一种高级而特殊的生命形态。诗的灵魂境界要求诗人获得感受之上的更高级的悟性,是诗性的深远和透彻。”他坚信诗是以灵魂境界来实现其经典目标的,红尘和世俗纷纷扰扰,诗却在静默中生长,“撞响灵魂的那一刻,应该是诗对人类的良知说话,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显现着一种感悟和悲剧性,但它永远与美同在”。善待新诗并坚守一份自信,相信新诗的价值,相信新诗的未来,加上诗人们的不懈努力,就是新诗的希望所在。

邢海珍对中国诗坛用力极多,不论是叱咤风云的名流,还是寂寂无名的初涉者,他都给予一样的热忱,他是青年诗人走向全国的重要推介者,常常是送上马,再送上一程又一程。《文学写作与诗性空间》一书分为“文学写作的心性”“新诗的艺术走向”“仰望诗的星空”上、中、下三篇,“下篇”中除罗门、董培伦,余者大致都是“年相若”的诗友。他说罗门的《麦坚利堡》“是一首‘大诗’……诗人的人道主义情怀没有停留于怨天尤人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上,而是把目光投注于人类命运及生命价值的终极思考。与其说诗的主体精神是对战争的‘审判’,不如说是对沉睡的人的良知的呼叫。诗中对于渐去渐远的历史风物的追怀,是叹息也是思考,哀挽于弥漫历史上空的悲剧云雾,是为了在前行路上找到光明和美好,是意在让善良和温暖祛除邪恶和悲凉”;说董培伦“对于爱情与人生、爱情与生存、爱情与生命等许多方面进行了充分艺术化的表现,积极探索,拓展了爱情诗的诗意空间……是新诗史上比较专业化的爱情诗人之一……以永远年轻的诗心在人生的路途之上,高唱着爱情的蓝色恋歌,他的生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以心血和文字温暖着人间”;说舒婷的《《思念》正是诗人表达‘孤寂’感的典型之作,一种时代的茫然,一种生存的无奈,皆在‘心的远景’里,皆在‘灵魂的深处’掀起生命的情感波澜。《神女峰》的‘叹息’比起《思念》则是加大了音量,感伤之中又爆发了人性的觉醒,多了几分抗争的勇气和力量。诗人对历史和传统道德的有力拷问,虽然仍属个性解放的范畴,但对于一个要挣脱专制意识的特定时代却有着不可低估的启蒙意义”;说叶文福的长诗《青藏铁路》“显现了人与自然的一种激情式的浪漫质地,并在诗情的泄导中有意地嵌入了国家、民族的政治性因子,使一位个体的‘英雄’有了被诗人创造性提升的可能……从一个人物与青藏高原、拉萨、青藏铁路的联系中,找到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关节点,使人物在诗中升华为远远超出了个体生命本身的

经典意义”；说林柏松“把个人一己的痛苦放到人类发展的流程中来看待，他的痛苦就成了广泛文化意义上的诗性内涵，应当属于整个人类苦难的一部分……但诗的高度却在苦难的意义之上冉冉升起，悲情之水汤汤，诗人在坚实的大地上站立”。邢海珍确信，诗人就是诗人，诗人不论写什么，只要不丧失美，就能在千山万水的一路跋涉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栖息之地。多年来他一直是李琦最热烈的鼓呼者：“如果想从小说进入哈尔滨，你去读阿成；如果想从诗里进入哈尔滨，那你就应当去读李琦。对于时而朝气蓬勃，时而茫然四顾的中国新诗来说，李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在中国新诗发展的进程中，李琦不是大红大紫的引领潮流的人物，但这位极其优秀的女性诗人如清风徐来，如水波纯净，为中国新诗开拓了富有个性情怀的境界，她以卓越的毫不做作的单纯和美丽，提升了诗的言说品格”。《李琦近作选》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雄辩、有力地响应了邢海珍的刚毅评判。

邢海珍有一本即将付梓的学术著作《绥化重要作家研究》，绥化实在是小到要说出半天别人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一般人不会认为这里的作家能重要到什么程度。但他不管，他认为用心写作甚至肯用生命来写作的作家就是重要的，重要与否同出身、名气完全无关。

三、教诗：赠人玫瑰

邢海珍的职业或云身份是大学写作教师。他显然是一个善于课徒的高士，牵其衣襟成为作家、评论家的亲传弟子或私淑弟子已有40多人，至于受其影响再也无惧动笔甚至干脆有了写作特长的人数则更为可观。“言传”之外还有“身教”，他既是讲授者，又是写作者，这种全身心的投入深深地打动了学生，引领他们步入了“乐学”的轨道，使他们真正懂得写作的意义，良好的局面也迅即打开，实现了学生潜质开发的最大化、最优化。有人说大学写作堪称中文教育的牛鼻子，牵一绳而动全身；还有人敢说能把文章写好的人几乎可以把世间的一切事情做好。大学写作课程一直处于备受冷落的地位，尴尬、边缘的学科境遇，加之生硬、抽象的教学用书和过于平面化的授课模式是造成这一僵局的关键因素。邢海珍在《文学写作与诗性空间》一书中指出：一方面写作作为现代人缺之不可的基本能力、基础能力，作为思维习惯和创新能力的逻辑起点，其重要性尽人皆知；一方面是大学对写作课程严重轻视，大幅度压缩课时，优秀师资不断流失，现有的培养方式收效甚微，这些早已使写作课程步履维艰，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中国写作人才的持续匮乏。

他注意到大学写作学科“偏于基础而学理支撑不够”，“强调综合而独立性不强”，“重视实践训练而有失随意和散漫”。写作课不是“讲坛”，而是一个“演练平台”。讲坛上是以“说法”者为主，而演练平台是以“学徒”者为主。在大学写作的

教学体系中，“课堂”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课堂不是封闭的，学生要以开放的心态从多种途径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在有限的课时、有限的问题、有限的阅读和有限的训练中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将使之终生受益。可由课堂延伸开去，建立一种长效的写作机制，写作教师要在课堂教学结束之后延伸学生的写作活动，继续鼓励学生的写作热情，继续关注学生的写作状况。写作教师除了“讲经布道”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个“教练”的角色，有效的阅读是写作教学实现突破的一大关节。所谓“有效”者，即是与写作意识，特别是与写作训练紧密结合起来的一种阅读。他特别强调大学写作教学活动中“真诚”这一价值尺度。“真诚”是人格的基本要素，是人的立身之本，真诚的价值向度则是写作的立身之本。大学写作阶段主要在于促进生命精神的提升，主要是经过引导和训练实现思考、心性、情怀等内在精神表达的顺畅与和谐。在大学文科的写作教学中，文学写作应是重点内容，而文学创作教育主要是培育写作者的人文情怀，以真性情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在诗意的抒写中来实现人格中的艺术化真诚的目标。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把“真诚”与写作教学中的“技术性”统一起来，以写作的方式来塑造人格，让写作成为心灵成长的一部分，并最终成为人的生命表达的“深层渴望”。

而多年来他更坚定地把新诗教学作为写作教学的突破口，因为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样式，其语言的独特性、思想的丰富性、感情的主观性、审美的创造性等，使其具有一切高雅艺术的共有特征，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在大众文化语境里实现一种捍卫。诗歌经常与艺术和美联系在一起，往往呈现着一种优雅的境界，须知诗歌功底是人最优秀的文化艺术素质。不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著述里邢海珍始终都在强调：诗歌是唯美、深刻的回望，只要与诗歌哪怕只结一小段儿尘缘，或写或读，我们的人生就会不同，这就是诗歌的意义。“诗教”不是简单的知识教育，不是简单的语文教育，而是承担人文教育的各个方面，甚至全部的社会教育，这样重要的使命可行也必行。可翻遍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实在找不到几首新诗，当代的、时间切近的、真正代表新诗成就的则更少。对于新诗，我们的课堂依然在强调句式整齐、使用韵脚、节奏鲜明与便于诵读，这表明太多的人对新诗的当下形态毫不知情。到了大学，我们的新诗教育就更加可怜。强调写诗的中文系全国也不易找见，至于说到还要读诗，不是出于考试，也必是出于研究的考虑。中文系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我们这个民族曾是很有培养诗人经验的，可惜始于发蒙几乎贯穿一生的这一种经验成了历史记忆。比之其他民族，中国当代诗人的童子功可能是最差的。学校没有拿出合格的新诗教育，却仍有一些诗人出现，仍有一些好诗人出现，这多多少少让人觉出了一点儿悲壮。诗歌是人类精神气质的提炼、艺术禀赋的绽放，是一

种表达人生、社会的艺术奇迹,比之其他文学文体,它更智慧、精致而纯粹。可是我们目前的应试教育体制,客观上造成了与新诗的对立,学生在考试的高压之下,首先拒绝的就是新诗,这当然会带来新诗教育的失败。当代诗歌不能穿越当代,也就很难做到薪火相传,这应该引起全民族的警觉。可以不夸张地说,与诗歌的距离最终会决定一个民族艺术素养的成色。

邢海珍相信新诗可以舒缓人的社会心理压力和生活压力,可以加强人的语言能力、想象力、美学素养,可以完善人的品格和精神,可以激发人的创新潜力,可以提高人的生活和处世品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会是对立的,富足的生活与诗意的栖居也不是矛盾的。其实严格说来,物质文明只是过程和手段,精神文明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但不是说富足的生活一定会走向诗意的栖居,这中间还需要我们太多的艺术经营与维护。诗歌是一种知识形式,是一种艺术创新,是一种审美教育,是一种人生态度。“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言志”,“诗言情”,诗歌的特质特别适于提升我们“求真”“乐善”“爱美”的人生大境。所以邢海珍强调:有效地推动诗歌教育,尤其是新诗教育,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道义,一种社会责任。

与严重蔑视新诗教育的时风相比,让人背脊生凉的是现代中国人很少有谁没写过新诗。中国诗人就是这从数以亿计的诗歌写作者中艰难走出的极少数吗?没有导师,没有准备,没有参考,一切只靠天照应。一大群人在暗夜中摸索,走了太多的弯路,多数人跌倒后再未爬起,只有寥寥几个才侥幸获得成功,他们付出的代价何其沉重。有人估计,现在每年发表于报刊(特别是民间报刊)、网络等各种传媒上的诗歌有几百万首。要知道现在以诗歌名义写下的一些文字,有的文体很是可疑。究竟有多少是诗,有多少是好诗,我们猜得出来。其实,广义上的诗歌教育关乎人的艺术、美学、思想、道德、伦理等全方位的精神气质养成并兼具难以替代的社会教化功能。诗歌里有一种永恒的清洁精神,新诗是现代人的精神憩园,是难得的人生旅伴,它也完全可以成为人类灵魂的最后归宿。一个疏远诗歌的民族是可怕的,所以珍视新诗教育,人人有责。

邢海珍从不讨好任何话语中心,却同时获得了学院派、作协派和民间派的三方欢迎,因为诗歌是他唯一的立场。诗歌是邢海珍的亲人,邢海珍也是诗歌的亲人。他是诗歌的信仰者,愿意把一生一世都交付给它,胸中永远鼓荡着一种难禁的、有关诗歌的激动。不论是讲义还是别的文字,对他而言都无分别,因为他始终都在写诗。他在诗歌之中还是在诗歌之外,都是教化世风的主动担承者。从作文里读到一学生家境困难,正为假期将至却苦无路费回家犯愁,他立即找到这个学生送他些钱,学生说自己作文内容是虚构的不肯接受,他却坚持让他收下了。一名学生用度没有计划动辄借钱,众人都敬而远之,可他想都没想就借了,面对同事的不解,他说学生是没办法才找到这儿,自己是他的最后机会,这个学生已痛下决心要改,而且

自己已告诉他不必还了。一次骑车出去，碰到一伙人正在围攻一个人，他立刻赶过去制止：“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不能把人往死里打！”这伙人很快聚拢过来，一起撕扯他。很多天过去后，他还浑身酸痛。其时他已年过半百，听到女儿说他“你早过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岁数，还逞什么能”时，他只是笑笑。手里是否握着笔，他都是诗人，他都会将美进行到底。

邢海珍从不去理睬什么所谓的理论体系，他的文字就是他的全部性情，从诗歌出发并且抵达诗歌，大到对中国新诗史的钩沉，小到对某一首诗的细部烛照，都以心奉之以情待之，他也因此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成为无数诗歌创作者、阅读者、论说者的知音。“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孔子之后，世间再无圣人，但历朝历代却从未缺少过大美的使者和大爱的信差。我们没有圣人之名，但可以有圣人之行，哪怕做得并不太多也可辟出一角晴朗。仗笔行侠，邢海珍选定的是诗歌，因为他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比诗歌更值得尊重，更值得神往，更值得信任，更值得托付！

目 录

文学写作的心性

文学写作的“理性”形态	3
文学想象的空间性	11
文学的情感流程	23
文学诗意的范畴界定	30
诗意是文学的本质因素	42
文学诗意的结构类型	53
大学写作的尴尬身份与教学突破	63
大学写作教学中的“真诚”价值向度	72

新诗的艺术走向

新诗“形成”及多元并存空间	79
进入“写作时代”的中国新诗	88
走向世界与返归故乡	96

新诗的白话之维·····	102
灵魂与血统·····	110
自信、“长度”与灵动性·····	120
语言的造化之功·····	129
意识形态的疏离与诗的个人化·····	136
外物的心灵化·····	140

仰望诗的星空

罗门与《麦坚利堡》·····	147
李琦的人生咏唱·····	153
舒婷的《思念》与《神女峰》·····	170
叶文福凛然而悠远的浩叹·····	175
林柏松的生命悲歌·····	188
董培伦的爱情书写·····	203
后 记·····	229

文学写作的心性



